

编者的话：

继出版商、作家、音乐人之后，本周贺卫方、刘晓原、夏霖等十五位法律人就百度涉嫌侵犯著作权发表声明，声明指“百度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以自身占据的庞大平台和垄断优势，诱导利用用户的逐利心理，从侵权作品中非法榨取广告价值并掠夺著作权人的微薄利润，广泛、持续地侵犯著作权人法定的权利与利益，理当为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至此，有愈来愈多的专业人士加入声讨百度的行列。

南方周末《“盗书贼”百度的避风港》一文清晰呈现了此事件的缘起和声讨者面临的困境。身为程序员的霍炬指出“盗版从来都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成建制的盗版，百看和百度文库都是成建制的盗版。所谓成建制的盗版，意思是说盗版者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甚至不需要知识和技巧，直接就可以‘享受’盗版”，而其造成的后果便是”他会摧毁几个行业，摧毁文化的基础。”经济学者郭凯则认为百度只是症状，不是根源，“维持市场最基本的秩序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政府看着被偷来的东西随意在百度书库里自由销赃而毫不干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北大“会商”一事亦是近日网络焦点。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生活独立、网络成瘾、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北大学生史小博在《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一文中细致分析了“会商”将带来的可怕后果，“从此，学工部门总算是扬眉吐气，坐拥生杀大权，而你想哭不能哭，想笑不能笑，想说不能说，甚至思考都会被人看透，你忐忑不安，仅仅是想避免被会商的结果”。

中国的大学教育近些年常受人诟病，其症结何在？前几日在车祸中遇难的前天津科技大学教师刘湘波在《老师是用来牺牲的》一文中讲述了他协助学生组建学生社团，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而他本人最终亦不得不辞职。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就指大学教育的使命“第一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生活，活出丰盛幸福的人生；第二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活在一起，共同建设公正社会”，“大学必须创造一个活泼多元，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让师生在其中自由探索”。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摘选文章主要来自 my1510.cn，同时我们也会选取其他网站和博客的好文和大家分享（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全部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盗】 3
7-1 黄秀丽、任玉岭：“盗书贼”百度的避风港 3
【析】 7
7-2 霍炬：最可怕的是成建制的盗版 7
7-3 郭凯：免费并不总是坏的，偷窃才是 10
【异】 13
7-4 史小博：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 13
7-5 顾猷：美国怎样对待“思想偏激”学生 19
【思】 21
7-6 刘老石：老师是用来牺牲的 21
7-7 周保松：重建中国大学的价值教育 27

在 Google Buzz 分享本期周刊

【盗】

7-1 黄秀丽、任玉岭：“盗书贼”百度的避风港



“该法官认为，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既不利于作者的权利保护，从长远来说，也阻碍了数字产品行业的发展。这位法官建议：‘法院也希望改变传统的版权获得方式，建立一种集体协商的机制，比如作者授权文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与服务商谈判，双方实现利益共享。’”

讨伐百度

百度文库最近在中国文化界与出版界惹了众怒。

3 月 15 日，贾平凹、刘心武、阎连科、慕容雪村等 50 位作家联合署名，发起了《三一五讨百度书》，指责百度文库盗窃这些作家的全部作品，对用户免费开放。磨铁图书公司总裁沈浩波更称百度文库做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版行为”，是“盗贼的行径”。

沈浩波正是这一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另一组织者是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在“声明”的起草者作家慕容雪村看来，百度的盗版行为肆意而露骨。他称：“有一天，忽然发现我所有的作品，包括 7 部长篇，短的文章，以及未写完的小说都被搬到了百度文库中……几乎每部小说都有上万次下载，被百度无偿地拿去赚取广告获利。”

然而，百度的“盗窃行为”又是巧妙的。2010 年，文著协联合磨铁公司、盛大文学连发 3 次声明，要求百度文库清查盗版链接和侵权作品，都被百度挡了回去。文著协常务副总干事张洪波介绍，百度的理由是：百度文库作为中国最大的在线文档分享平台，其运作模式是由网友上传文件并共享，其上传作品是不是侵权，百度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

当年 11 月底，盛大文学网站在上海起诉百度。盛大文学 CEO 侯小强曾称，盛大文学旗下的知名小说中，有 95%以上被盗版到百度文库中，给盛大带来的损失一年超过 10 亿元。此案尚未开庭，百度我行我素。

百度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也已声名不佳。3 月 5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将百度公司列为“恶名市场”。日本也有一些出版公司欲在近期起诉百度侵权。

3 月 16 日，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发表抗议信，要求百度停止 MP3 非法下载。同一天，当当网 CEO 李国庆抗议百度盗版，在微博上称将从 4 月 1 日起停止在百度投放广告。3 月 19 日，“十三月唱片”联合周云蓬等音乐人发出公开信，号召各企业在百度 MP3 放弃盗版前停止向百度投放广告。

被百度文库“盗窃”了学术论文的网友“VictorPih”认为，百度文库的做法已在侵犯很多学校的知识产权和学者的著作权，但投诉之后，“百度什么时候管过？”

榕树下一位特约评论员称：百度有一半的流量和侵犯知识产权脱不了干系。盗版和侵权，已经深入它的骨髓。

据沈浩波透露，3·15 声明发出后，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曾委托一位副总裁前来沟通，双方商议在清明节前谈判。3 月 22 日，文著协已确定谈判队伍，包括张洪波、沈浩波等人。

百度文库所谓“盗版”的长期后果，被 50 位作家的联名书表述得极其严重：“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开始表态。3 月 21 日，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会见沈浩波等人时称，他已要求百度整改。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王自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该局支持作家依法维权，呼吁并鼓励作品使用人包括企业依法、诚信经营，并称，“不管企业大小，如果违法或者违规，我局将依法查处”。版权司 2 月底曾约谈百度，3 月初百度提交了整改报告，该局已委托北京市版权局进一步调查。

盗版的“避风港”？

面对舆论的围剿，百度的回应充满官方话语。3 月 22 日，百度公司回复了南方周末的采访，声称“百度高度重视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作家及版权方发现文库用户在上传内容时有侵权问题，只要通过文库投诉中心反馈情况，一经核实，百度会在 48 小时以内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理”。

百度文库还称：他们一直在努力开发版权识别的新技术，希望从源头控制盗版作品的上传，预计近期此项新技术将上线运行。

百度的这种姿态，令很多著作家不满。“侵权的成了大爷。”慕容雪村感到无奈。

“是现行法律给了百度这种操作模式巨大的空间。” 律师魏士廪和学者刘德良一致地作出了不同于情绪化看法的判断。他们分别供职于北京市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法律专业委员会、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网络法律研究中心。

2006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22 条第 3 款在业界被称为“避风港原则”，意指网络存储空间提供者如果“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不构成侵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只有在服务商“明知或应知”属于侵权作品仍不作处理，未尽到注意义务，才构成侵权。

根据此原则，一个作者发现自己的作品被盗版后，维权的方式为“通知——删除”。而百度的回应显示，百度拥有 40 人的团队处理投诉，作家只要通过文库投诉中心反馈情况，百度会在 48 小时以内迅速核实并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理。

然而，能够及时发现盗版，并希望百度删除的作者是非常少的，大量的盗版在作者毫不知情时就已经传播。等到作者提起诉讼，盗版已经泛滥成灾，百度已通过广告获取了大量收入。

另外，作者更多的并不是想删除自己的作品，而是想要分享这一部分收入。但是，要想让百度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依据现行的制度，惟一的途径是谈判，谈判不成只能诉讼。

由于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本来就弱小的受害者的力量再次遭到削弱。对一个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来说，证明自己尽到注意义务，不知道盗版是很容易的，而对于作者来说，证明百度“明知或应知”是盗版还故意放纵的，则是极为困难和繁琐的。“避风港原则”诞生于 2006 年百度和环球、华纳等 7 大唱片公司打版权官司之际。在 2005 年，百度因为在自己的网站直接提供 MP3，官司惨败。百度遂改了运作模式，只提供链接地址。这样百度从网络服务内容直接提供商，变为第三方搜索引擎、链接和存储空间提供者。责任由此转移到单个网民身上。而在互联网时代，追究单个网民的责任是很难的。

2008 年，百度对七大唱片公司的官司反败为胜，靠的就是“避风港原则”。法院认定，百度 MP3 搜索引擎搜索到的内容来源于上载这些 MP3 的网站，百度无法识别、预见及控制这些 MP3 的合法性。“这一原则是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学来的，但实践证明，不适合中国的产权保护。”刘德良认为，原因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了垄断，破坏了知识共享与版权保护之间的平衡。

张洪波和沈浩波则认为，百度滥用了“避风港原则”，造成了事实上的法律难以追究的大量盗版。

怎样让作家分到“蛋糕”

百度有没有滥用“避风港原则”，法官如何适用“避风港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著作权庭有关法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依“避风港原则”对侵权与否的认定，常常争议很大，“法官判案只能看具体的情况，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

适用“避风港原则”的关键是被告有否“明知，应知”。百度文库及百度百科、百度 MP3 屡屡卷入的侵权诉讼，原告认为，明知这种经营模式有风险还做，即属于“明知”。百度则认为，所谓“明知”，是要明知具体的作品有否侵权。

故而法官判案只能“看具体的情况”。比如一部电影放在网页显著位置，在排行榜上推荐，肯定就是“明知”，而要翻好几页才能找到的作品，就很难说是“明知”。

该法官认为，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既不利于作者的权利保护，从长远来说，也阻碍了数字产品行业的发展。这位法官建议：“法院也希望改变传统的版权获得方式，建立一种集体协商的机制，比如作者授权文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与服务商谈判，双方实现利益共享。”

沈浩波等人认为“避风港原则”会成为一种法律纵容，长此以往，“整个出版业和作者都将没有未来，出版业从传统向数字出版转型将陷入泥潭，做正版数字产品的网站将被逆淘汰”。

魏士廪律师认为，短期内这种危害也许不明显，但长期一定会带来整个文化产业创新性的萎缩，音乐行业已是前车之鉴。

然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并不是修改几个法律条文就能改变的。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要从以作者为中心的版权保护模式转到利益分享模式。

刘德良表示，这种转变必须先从立法上做起，而不能指望百度这样的大公司。传统的版权保护制度在于控制，发现盗版即通过追缴、销毁、删除的方式，保护权利人以正当的渠道获益。但是，网络传播的迅速和大范围，造成控制失效。一旦侵权行为发生，靠删除完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时期，立法理念要从控制模式变为分享模式，甚至可以将利益分享模式在法律规定中明确下来，鼓励产品使用者。这就需要著作权法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做重大调整。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张抗抗提出了《关于尽快修订著作权法的提案》，认为现有的网络信息传播保护法律完全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据媒体报道，著作权法的修改已被有关部门纳入了立法计划。

而已被侵权的沈浩波等人，希望在立法还无法改变的当下，政府应要求百度文库“先关掉这种盗版模式”，然后再考虑“和产品使用者利益分成”等方式。他们希望，这次行动，能真正促进中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改进。

（南方周末记者王小乔对此文有贡献）

（黄秀丽，南方周末记者。任玉岭，南方周末实习生。原文地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56810）

【析】

7-2 霍炬：最可怕的是成建制的盗版



“要说什么破坏了社会稳定，这东西才是，他会瞬间摧毁几个行业，摧毁文化的基础。盗版从来都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成建制的盗版，百看和百度文库都是成建制的盗版。”

我是一个靠写代码生活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和创造文艺产品的人--比如写书的作家--是非常一致的，盗版问题同样影响着我们，只不过我们用的是和作家不一样的语言来创造产品。比作家们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完全脱离中国市场，去做英文的德文的日文的法文的软件，而且特别不要做中文的软件，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在一个正常市场内销售并获得应有的收益。我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无解，于是我们放弃了。我们不再愿意创造中国人普遍可用的工具，因为赚不到钱。作家们比我们悲哀一些，因为文化和语言是有民族性的，你们不能把中文的作品卖给其他国家的人，也很难快速学会用其他文字写作。于是，你们只能死磕。

在前面的这些年，大家始终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从来没有什么行动，虽然你们可能早就从百度 mp3 下载音乐，下载盗版软件，损害着其他领域的创造者们。今天你们也面临着一样困境。现在痛苦终于降临到了你们身上。

或许你们还记得，不到一年之前，google books 索引你们的书，仅仅是索引（用户只能在搜索的时候展现片段内容做为提示），而不是让用户阅读，google 就愿意付给你们 60 美元。但你们嘲讽的拒绝了，你们认为那是作恶。比如王晓峰这篇 《股沟挖了一条沟》 当时我就明白，过不了多久，你们会后悔的，但是确实没想到来的这么快。事实上 google books 确实没有作恶，他们做的事情和书商摘取你们作品的片段放在广告宣传页上一样，让读者搜索感兴趣的内容的时候，知道你的书中有提及，如果要阅读，需要付费。

数字化大潮势不可挡，这本来是全球搜索巨人释放的极大的善意，这大概也是数字阅读解决方案中，技术和商业结合最好的方式。可惜王晓峰这种自傲的文人认为是作恶。他那篇讽刺 google 的文字到现在还能搜索到很多，我承认王晓峰影响力不小，但他错了。大部分作家或许都是这样，他们活在自己理解的世界中，不愿意学习新东西，甚至连多想一些都不愿意。在他们的世界里，就是出版卖书赚钱，从来没想到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在上一次对 google 的攻击

中，只有韩寒认真的了解了 google 到底干了什么，并公开发文支持。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的可以读韩寒这篇 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fzmm.html

而今天你们看到了百度文库可以不花钱看你们的文字，于是你们集体愤怒了。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这还不算什么，对你们更有杀伤力的，是百度和爱国者一起做的叫做"百看"的电子书。新闻见此：http://tech.sina.com.cn/digi/mp4/2011-02-23/19475209593.shtml 这是爱国者出的电子书阅读器，它的特点是可以直接连接到百度文库。今天你们知道了百度文库是什么，那你们终于可以想象当人手一本这样的电子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们只要买这么一个设备，就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而且阅读体验和纸书差不多，可以随身带着，比纸书方便多了。这个计划如果成功，那就是你们这个行业的灭顶之灾。百看我一不小心就会打成白看，这名字起的真好啊。

呵，对于百度和爱国者，他们管这个叫做"希望能将更海量的知识、文档和消费者分享"，对于你们，意思是人们再也不用花钱买你们的书了，到时候恐怕不仅作家会死，出版公司也会死，大出版社或许不会死，但他们也只能靠印教材活着了，印厂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要说什么破坏了社会稳定，这东西才是，他会瞬间摧毁几个行业，摧毁文化的基础。盗版从来都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成建制的盗版，百看和百度文库都是成建制的盗版。所谓成建制的盗版，意思是说盗版者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甚至不需要知识和技巧，直接就可以"享受"盗版，这种盗版用起来比正版还舒服（正版无论如何都要有个购买过程，总是多了一步）。这时候，谁会傻瓜的麻烦去付钱呢？在和成建制盗版对抗的过程中，我们软件作者们想出了最多的花样，各种加密，各种功能限制都被用来保护软件，软件作者以牺牲产品体验为代价进行加密，甚至曾经不惜破坏盗版者的电脑。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失败了，至少在中国失败了，到今天还有专门盗版 iPhone 软件的网龙活的很好，并以此做为盈利模式。幸好在美国，通过法律，大家都成功了。对于搜索引擎所谓的"避风港原则"，美国也有"数字千年法案"应对。（google 的数字千年法案看这里 http://www.google.com/intl/zh-CN/dmca.html ）。按照这个历史看，如果不改变方法，对文字作品的斗争，在中国一样会失败。

这次所有作家写出来关于这件事的文字，看着都是那么的无力。请问你们面对抢劫者的时候，哭穷，叫惨，这些都有用吗？没用的。你们需要战斗，而且要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来战斗，把对方拖入你们擅长的战场中，并击败他。对于作家，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文化摧毁对方的品牌。做法很简单，不用正面去攻击骂对方，你们只需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作品中，让作品中的角色说话。比如很酷的主人公会对别人说"用百度真丢人"，漂亮的女主角拒绝追求者的时候会说"你还用百度，这么土，我才不跟你交往"。我这只当扔块砖，具体的技巧你们擅长，就像前面提到王晓峰那篇愚蠢的 blog，影响了很多人，他们会拿着这个来说"你看，google 也作恶嘛"。作家本身就是媒体和文化的创造者，你们有能力不依靠别人，仅靠自己在文化和品牌上摧毁对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把作品中反面角色的名字起成李彦宏"的办法并不好，因为你们要对付的是百度这个品牌，并不是其创始人。换言之，李彦宏卸任百度 CEO，盗版的状况大概也不会变好。

前面很多年，google 被欺负你们不说话，甚至你们还参与欺负 google。现在，你们知道了 google 的好。虽然我觉得你们活该，但现在还不算太晚，来战一场吧！这战斗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对方有钱，你们很有可能会被要求删除相关内容，很有可能百度在你所谓的媒体投放了巨额广告，你的领导要保护他。但这其实都不算什么，百度虽然势力庞大，但也比不上***强大，你们不也在作品中变着方的挖苦他们吗？这就是所谓"你们擅长的战场"。

你们大概会质疑这种办法的效果。这确实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但确实有杀伤力，文化的威力，你们最清楚。只不过，你们得丢掉心理的幻想，不要觉得对方是可以谈价钱的。你见过拉磨的驴子和主家谈价成功过吗？对于百度，你们就是那驴子。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甚至不是你们自己的战争，是文化行业的战争。请你们不要拒绝新媒体，传统出版一定会消亡，而且消亡速度在逐渐加速，要学会正确的使用新媒体。或许当你们这么干了，百度会付出公关费来摆平你们，他们现在每年也支付着大量的公关费对付各种负面，但这些钱不会给你们这些创造内容的人。甚至将来百度变成唯一渠道的时候，你惹急了了他们，他们会干脆在搜索结果中封杀掉你。如果大家都用百度，你这个人在互联网的世界就像不存在一样了，不要以为荒唐，这就是现在网站站长们碰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动手还不算太晚。除此之外，你还能做的了什么？

至于不用百度还能用什么，我的妈妈 65 岁，用 google 几乎所有的产品。其他，你们自己看着办。

Google 退出中国的时候，你们一声不吭，之后的两个月，你们对 google books 口诛笔伐。今天，如果你决定不做什么，不写什么，至少也应该把我这文章让更多人看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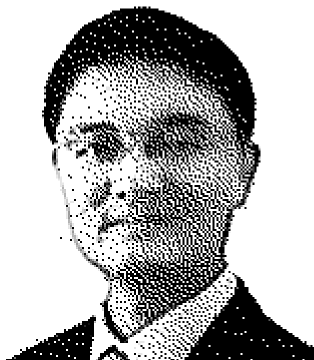
注 1：王晓峰并非错字"王小峰（真名王晓峰，笔名王小峰，网名带三个表）" 来自互动百科

注 2：去年我写过一篇关于百度和 google 的 blog，如果你看完本文有兴趣知道更多，请看这里 http://blog.devep.net/virushuo/2010/01/14/blog56google_blogtinyfool_1_go.html

（霍炬：程序员、知名博客。原文链接：http://blog.devep.net/virushuo/2011/03/26/post_78.html）

7-3 郭凯：免费并不总是坏的，偷窃才是

“政府看着被偷来的东西随意在百度书库里自由销赃而毫不干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百度书库只是一个症状，而不是问题的根源。那些热血作家，就算他们能搞定百度，他们能搞定整个中国网络吗？销赃一定要在百度书库吗？”



一、

离办公室不远的那家 Borders 书店即将关门大吉了。这是这家巨型连锁书店倒闭重组的一部分。根据公开报道，Borders 将关闭其 600 多家书店中的 200 余家。在这家经常路过的书店关张之前，我专门去逛了一下。

平时那个明亮，书籍整齐码放的书店，现在像是变成了一个杂货市场，书像被烂柿子一样等着被人挑拣。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连书架一起买走－那个书店的每个书架上都贴着一个条子：如需大量购买书架，可以和经理联系。

但我并不为 Borders 的倒闭而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替代 Borders 的是网上书店，电子书和电子阅读器。Borders 这样的传统书店是迟早要倒的。但书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书，只不过是用更方便，更低价，更绿色和更先进的形式存在了。熊比特的“创造性破坏”，就在我们眼前发生，这跟数码相机让传统的胶卷制造企业走向没落，ipod 和各种播放器让传统的唱片店倒闭，Netflix 和各种点播服务让 Blockbuster 这样的传统影碟出租店关门一样。

二、

网络是个神奇的东西。这点我感受很深，比如说，我在《一沙一世界》的后记里就写道：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一本书的问世，比我想象的既更容易又更困难。

容易是因为网络的力量。如果还是生活在传统的纸媒世界，一个远在异乡的留学生大概很难有机会把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写下来，然后能够和成千上万素未谋面的人分享。我在北极的上空写，我在莱茵河畔写，我在海德公园边写，我在喜马拉雅的山脚下写，我在大草原上写，然后哪怕只要有一分钟的网络连接，这些博文就会在瞬间和所有的人分享。没有编辑会退稿，没有人会审查我的文字。

这本书从酝酿到最后出版，也完全是通过网络进行的。除去我和本书的特别策划覃子洋女士在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大堂里 20 分钟的简短交谈外，这本书的全部构思，策划，撰写，编辑以及修订，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和 MSN 完成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网络，这个过程会变得多费时耗力。

我是真心真意的感激网络带来的便利和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你正在看这个博客，那意味着你也正在享受网络的便利：你正在享受网络上免费的文字。事实上，我不仅没有对博客收费，我甚至是倒找钱让人来看的，因为我一年还得为 www.kaieconblog.net 这个域名和相应的托管服务花几十美元。

三、

有人大概会想，中国的网络，简直就是“网络＋创造性破坏”的典范了。比如说，百度文库又是免费的，又是在取代那些传统的书籍。这难道不是把网络的便利发挥到极致吗？这难道不是至多牺牲了一小批文人的利益，而更绝大多数人带来福利的服务吗？

错！错！错！

知识产权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创造出来的固定成本大，而复制起来的边际成本极小，网络让这个成本基本上接近于 0。小时候就听一个笑话：说一个机器坏了，请了一个工程师来修。工程师看了看，在机器上画了个圈，说在这里打开就行。结果人就照办了，然后机器就修好了。工程师要收 100 美元。人就抱怨了：你就画了个圈啊，怎么能收这么多钱？工程师说：知道画在哪，99 美元。画圈，1 美元。

你如果要求所有工程师都只收 1 美元，那结果会是，很快就没有工程师了。好书，不是靠金钱回报就能写出来的。但是，如果你不给好书好的回报，好的作家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迫于生计他们也得改行，因为在很多人还没跨出写作的第一步前就会被这个没有“钱途”的职业给吓跑。

有人会说，中国的现状是自由市场的自然结果，是充分竞争。不是的，市场存在的基本基础是承认产权，在此基础上才有生产，交换，分配的消费。中国的这不叫自由市场，是叫强盗横行。有人会说，那为什么美国的网上也有那么多免费的东西，难道这不是趋势吗？中国网络和美国网络的区别是，美国的那叫免费，中国的那个叫被免费。如果你觉得免费和被免费是一样的，那就请不要再抱怨被增长，被涨工资，被就业和被幸福了。

好多人跑去攻击百度。我觉得攻击错目标了。百度是个要盈利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差点，能赚钱就是硬道理。整个百度书库事件里负有最大责任的是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维持市场最基本的秩序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政府看着被偷来的东西随意在百度书库里自由销赃而毫不干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百度书库只是一个症状，而不是问题的根源。那些热血作家，就算他们能搞定百度，他们能搞定整个中国网络吗？销赃一定要在百度书库吗？

五、

电影《辛普森一家》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字幕，大意是：搞不清你们这些正在看电影的人有什么问题，你们明明可以在家里看免费的《辛普森一家》（电视剧），可还偏偏要花钱来看

电影，脑子进水了吧？我本来想在《一沙一世界》的序言里也加上类似的话的，后来觉得这个笑话可能会被误解，所以干脆就没用。

免费并不总是坏的，偷窃才是。

（郭凯：经济学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原文地址：http://www.kaieconblog.net/2011/03/27/10340/）

【异】

7-4 史小博：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

“从此，学工部门总算是扬眉吐气，坐拥生杀大权，而你想哭不能哭，想笑不能笑，想说不能说，甚至思考都会被人看透，你忐忑不安，仅仅是想避免被会商的结果。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反右也是反着反着才发现似乎全国都变成了右派，文革也是喊着口号打打杀杀才发现自己也加入了反革命的行列。”



会商制度将北大学生共分为十类：“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而对着十类同学进行相应的“会商”处理。

“会商”以官方的说法，叫做“所谓会商，就是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学院组织相关方面，如教学、教务、心理咨询、后勤服务等部门的老师，甚至邀请校外专家，对这些同学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

这段话很长，大家肯定也不会仔细看。这与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样，都是看不得表面文章的，否则你一个字也看不懂。下面我就给大家细细解释下，什么是会商。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会有许多弱势群体，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弱势群体在反右时期，是指那些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文革时期，是那些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人，年纪大一些的人对这些定是不陌生的，我们国家的朱镕基总理也是右派出身，国家主席也曾被活活虐死，不少中共的高级官僚对曾经的惨状与浩劫至今都是历历在目的。若是有同学并不明白所谓反右与文革，那么姜瑜老师的话将对你很有帮助，你被扣上帽子与成为弱势群体的下场就是，“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任何法律都保护不了你。”

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切很遥远，其实就在今天的中国，弱势群体也是遍地都是，弱势群体往往是国家机关用概念鉴定的结果，它会有一道红线，比方说你信仰某种宗教，比方说你家的房子影响了国家的建设，比方说你的言论不对某些人的胃口。弱势群体的标志便是你已经不再是个人，对于你的任何处理结果，都是无需征求你同意的（虽然通常是建议），即便这种决定是拆掉你家的房子，强行将你送到否地，将你关进监狱，正如希特勒治下的犹太人，他们不再是

人，任何对于他们财产与生命的剥夺都是合法的，正义的，毫无争议的，可以年纪大的人听到这一切会毛骨悚然，而年纪轻的人，恐怕因为没有经历，还足以面对。

而大学里，也是有弱势群体的。这些人是所谓网瘾患者，所谓学习困难者。据我所知，查晶老师所言，会商制度也正是从他们先开刀的。当然绝大多数同学会同意，网瘾患者是活该（尽管如何界定网瘾模糊不清），学习困难者也是活该被会商，甚至活该被退学，因为学校有正式的规章制度，对于绩点低于某数值的人进行劝退，学校没有暴力机关，不能把学生关进监狱，也不能拆了学生家的房子，退学与开除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

我是完全同意学工系统的人是出于善意对学习困难者进行会商的，也相信学工系统对于学习困难者的会商通常是避免对学生进行劝退，帮助他顺利完成学业的。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一旦你被扣上了所谓网瘾患者与学习困难者的帽子，会商制度对于你“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针对性的帮扶方案”，你恐怕是无力拒绝的，尽管这个方案仅仅可能是建议。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免责，学校对你进行会商后，你退学哪怕去炸地球，都和学校没有关系。同时，若是会商的建议是退学呢，当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你活该会商，活该退学的时候，你不应该期待有更好的结果，即使他们是想帮助你。

这导致今后很可能，所有退学的同学都要事先经过会商制度的鉴定，退学乃至处分这一原本属于非学工部门的权力，将随着会商制度的建立，渐渐转移至学工系统，建议权也将渐渐成为一种强制权。当然，这时绝大多数的同学仍然会认为，网瘾患者，学习困难，活该被会商，活该被退学，而且会商制度的一阶段，查老师已经详细解释过：学习困难者是目前会商制度的重点治理对象。

但是我们会想，学习困难者都被会商之后，带着惋惜与孤独离开这个学校后，下一个会是谁？有九类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九类人不会被会商，也就不会被写进制度里，写进去就注定了被会商的命运。下一波同学，可能会如查老师所举例的，一些因为失恋而心灵脆弱的同学。

心灵脆弱自然是很难解释的，可能衡量标准是你回宿舍抱怨两句，恨死这个女人，恨不得杀了她，也可能是失恋之后捂着被子哭了三天。当你因失恋哭了三天，怀疑心灵脆弱，被纳入会商范围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两件事，一是你几乎一夜醒来就被扣上了“心灵脆弱”的帽子，成了一位“心灵脆弱”者，成为会商制度的目标，尽管你会获得更多关心，这一切却没有一项经过你的同意。你立即变成了一个异类，一个边缘人物，这一切都是帽子与概念定义的强大威力。第二件事情更加可怖，你是一个人偷偷在被子里哭了三天，自以为无人所知，却早已上达天庭，会商之后（尽管可能是秘密的），宿舍的另外三个舍友突然在你看来都分外陌生了，谁说出了这一切，可能是那个党员，可能是那个和你作对的，还可能是那个最不起眼的。总而言之，原本你最信任的朋友，开始变得渐行渐远，他们也可能如此怀疑你，因为会商制度的保密，让你们无从知晓对方被会商。你们的友谊荡然无存。

更坏的情况是，会商制度尽管是保密的，但是不知为何，还是传的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时候你便彻底成为了边缘人群，一个心灵脆弱，可能会影响学习，甚至可能有自杀危险的人。你可能没有朋友，甚至有一个两个也会被怀疑为告密。但是这又有什么奇怪呢，一个被扣上帽子的人，边缘化的人，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朋友的。这时尽管可能因为你的积极改造，被摘掉了“心灵脆弱”的帽子，被拿出了会商制度，但你不过是个“摘帽右派”罢了，一个“曾经会商”者。当然，这比起开除来好多了，我们应该正确看待，乐观对待这个学校的制度，当然，我这里忽略了因心灵脆弱引发学习困难，乃至退学的人，他们会更惨一些。

当然这时有些同学会说，我学业过关，不谈恋爱，即便谈了恋爱也是铁石心肠，绝不为情所动，分手第一天我就紧密投入了学术与为人民服务之中，只是平常食堂涨了两毛钱我会有所抱怨，乃至对于国家里各类各样的敏感词有所关注，这时我敢肯定，你在会商制度下的下场，绝对不会被心灵脆弱者更好。因为，实际在我看来，会商制度就是为了你设计的——可爱的思想偏激者。

当然这是我的诛心之论，大家忽略就好。与心灵脆弱者一样，你会发现自己抱怨涨价，关心正义公平的言论不知何时便早已上达天庭，被确定为会商对象。众所周知，这种同学在学校是比较招人恨的，吃饱没事关心公平正义，在这片土地本来就是一种罪过。对你最大极限的同情，不过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何必呢”。所以，我相信，对于你的任何帮扶，都不会有人同情你，等待你的，将是无可拒绝的帮扶建议。当然，我希望这仅仅是组织你学习人民日报，定期上交思想报告，或者监视周围同学而已，不至于取消奖学金，记过或是开除。尽管我们知道，经过会商制度，学工系统很有可能已经拥有了上述权利。

思想偏激者这群疯子活该被处理，对此我也不敢有异议。但是我渐渐发现剩下的“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我终究未能使自己逃脱其中一项的笼罩，或者我已经在前面的三者中被处理了。从此，学工部门总算是扬眉吐气，坐拥生杀大权，而你想哭不能哭，想笑不能笑，想说不能说，甚至思考都会被人看透，你忐忑不安，仅仅是想避免被会商的结果。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反右也是反着反着才发现似乎全国都变成了右派，文革也是喊着口号打打杀杀才发现自己也加入了反革命的行列。

这个故事似乎变得越来越熟悉，希特勒找犹太人开刀，他们人种不过关，活该被清理，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这帮人思想偏激举止古怪，也不是什么好鸟，他们追杀工会成员，这帮人平常老是罢工，搞得城市瘫痪断水断电，也是应有之义。最后，他们奔我而来时，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众所周知，独裁与纳粹永远都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

看到这里，如果你寒毛四起，请放轻松，别害怕，学工系统不会这样的啦。我和他们共事很久，他们都是好人。除了想升官一点阴暗功利的小想法，平时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也没有什么恐怖的大阴谋，只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在邀功请赏时，却一步步走向了与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为敌的境地，却一次次摧毁着北大弥足珍贵的价值与精神。兹体事大，事关北大清望与精神，更会影响今后师弟师妹的心情与前途，精神是都是虚的，外人看的（虽然校方显然更看重的是这点），师弟师妹的前途与心情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的一点话，是送给查老师本人的。如果您真有诚意仅仅是帮助学业困难的同学，便删去会商制度中其他九类人的条款，如果您真心帮助北大同学，请承诺会商制度不会采取任何对学生的惩罚与管制措施，并将此郑重写入会商制度的条款（我实在不相信领导的承诺）如果您真心诚意地为北大的同学好，请收回会商潜在对象“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这带有侮辱性质的评论（当然您会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只不过是媒体的歪曲罢了），这对您好，对北大同学也好。

2011/03/27 于北京大学

还有一句话，送给其他大学同学，请你们持续关注北大的会商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中国的大学生，北大会商制度一旦建立，将会以燎原之火的势头为众多高校所借鉴，会商制度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高校普遍实施的学生管理新形式，你们与北大的同学休戚与共，我们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共同进退。

附：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呢？

——就会商制度致所有北大师生校友的一封信

罪恶的北大会商制度终于被曝光了，这是一个旨在将全面控制学生制度化的残酷设想，其将北大每个活泼而丰富生命划分为十类称呼充满偏见与歧视的群体，之所谓“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并对于这十类人群进行名正言顺的“会商”，“会商”这个词语充满暧昧与多义，实际上将今后学工系统采取的一切行为正义化与制度化，“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在此处，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含义。

这项制度率先与北大元培学院与医学部试点，这甚至带有一丝骄狂的挑衅气息。蔡元培校长作古仅仅七十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训诫犹然在耳，这项公然粗暴侵犯基本人权与思想自由的制度居然率先在元培学院实施。元培校长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这是想鞭尸，还是想挑战北大人最后的一丝忍耐底线，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仅仅知道的是，这项制度随时有向北大全校推广的可能。这项制度一旦建立，诸位扪心自问，人人皆有被会商的可能，人人皆有被偏见与歧视掩埋的可能，北大四年的草样年华随时可能化作一场无法摆脱的梦魇。

众所周知，北大在此之前已然陷入一种深刻的分裂之中，极少部分人，以极其恶心与肮脏的行为，将他们与所有的北大师生校友分裂开来。当教授在课堂中挥洒才情指点江山之时，脊背却阵阵发凉，唯恐有信息员与义愤填膺学生的举报；当学生奉行师长所言追求真理独立思考之时，却不得不提防周围信息员的汇报与检查，乃至会商制度无微不至的关心；对食堂涨价与

校内交通混乱的抱怨，随时可能成为思想偏激与谈话考察的基本依据；论坛对于任何北大的意见与反思，都成为了敏感话题而无法显示；任何学生对于北大提出建议，都怀着要受到删贴与谈话的忐忑心情，总而言之，一切对母校的深切感情与关注，被诬蔑为别有用心与思想偏激。

十九世纪，德国的独裁者腓特烈威廉三世，可以荼毒他的国家，却不敢视柏林洪堡大学的自由传统于无物，不敢将监视与举报带于学术自由之上，更不敢将这个学校追求自由与思想的师生诬蔑为思想偏激与别有用心，甚至扬言将他们送入疯人院。这是大学尊严的明证，更是对真理与学院的敬畏。而两百年后，在我们这个共和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出如此丑闻，将审查与举报视为家常便饭，将践踏自由的会商制度看作是制度创新，将钳制思想的谈话看作是关心帮助。

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这是纳粹，还是纳粹，还是纳粹呢？

感谢北京晚报将这一切全盘托出，感谢新京报正在介入，更感谢诸如李承鹏于建嵘等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开介入，感谢门户网站将此制度彻底曝光于头版头条。这并不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早已习惯了冷漠与麻木，北大人在面临会商制度之时，旁人又何必顶着众所周知的风险为你出头呢？

因此我们需要感谢旁人的友谊与善意，这种善意弥足珍贵，尤其是在我们知道，有的人会将此看作是对北大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当作对北大不负责任的指手画脚，并且可能未经我们的同意，代表北大斥责他人。

当我们的同龄人在普林斯顿的拿苏堂前，马萨诸塞的哈佛庭院中，耶鲁的康乃狄格楼中谈笑风生激扬思想之时，定想不到，这些在他们看来如空气一般的必需品，在我们的校园，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奢望与乞求，这不仅是北大提出思想自由近百年之后的耻辱，更是我们与欧美一流大学最深刻与根本的差距。

这并不是北大人的错。监控与举报从来都不是北大人的思想信仰，歧视与会商也从未成为北大的象征与精神，北大每位普通学生与教授，都是神往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骨与精神才来到这个园子的。他们对这个学校的精神与内涵怀着最为深刻的情感与坚持，为这片精神家园浇灌着自己的思考精华，而这会商制度却将横行于北大校园，成为北大形象的象征。

有人需要为这一切负责。他必须要为北大精神的沦落负责，为北大思想自由的丧失负责，为北大形象的一落千丈负责。会商制度的设计者与执行者需要对这一切负责。撤销会商制度，尊重北大自由之精神，是我们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这是每个普通的北大人，每个北大的普通学生，每个北大的普通老师，每个北大对母校怀有深切情感普通人的最普通而切实的请求。

我们终究相信，罪恶的制度最害怕的是阳光与真理照射，会商制度不会，也不可能在北大实施，但这需要你我的真正关注，需要北大老师如当年蔡元培校长面对残暴军阀气定神闲般保护我们，需要你我在这项制度面前，表达出自己的反感与不快，表现出作为一个北大学生老

师，甚至是一个人的尊严与自由，我们知道这并不容易，在这片土地上，奢侈品从来不是路易威登，而是尊严与自由。

但，我们义无返顾。

（史小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c7e7eb0100sx5t.html）

7-5 顾猷：美国怎样对待“思想偏激”学生



“和美国学生的这些‘偏激’相比，北大学生只能在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中寻找安慰。‘祖上阔过’。”

美国也有“思想偏激”的学生，而且“偏”得厉害，“激”得重大。对于学生“偏激”的思想，美国实行“司法最终解决”。一些涉及学生“思想偏激”的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定谳，通过这样具体案件的审判，不断地为社会制定言论自由的规范。

什么要件构成“思想偏激”？在北大，对于学校伙食涨价提出批评就是“思想偏激”。不过，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学生“思想偏激”案，一般都涉及重大的主题，比如焚烧国旗、拒绝遵守向国旗敬礼的法令、在越战期间佩戴黑色袖章到校上课表示反对战争等待。

在北大，对于“思想偏激”采取“会商”制度。“会商”成功，毫无疑问显示了组织的力量；“会商”不成，组织也有的是解决办法。但是对于受害的学生呢，有什么救济途径？中国有宪法，也有各级法院。制裁异见维稳和谐的法院，顾某常见；依照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法院，顾某不常见。这也是中美法院在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的重大不同之处。

1943 年，西维吉尼亚州发生一起小学生拒绝向美国国旗敬礼案。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爱国主义高涨，加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恐惧，美国若干州和地方制定了法律法规，要求学生们想国旗敬礼并背诵效忠誓言。西维吉尼亚也制度来类似的法令。当地小学生巴尼特拒绝向国旗敬礼，学校当局就“会商”。巴尼特的父亲就站出来挑战向国旗敬礼的法律的合宪性。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法官在判决中写道：如果说在我们的宪法星系中有一颗恒星的话，那就是没有任何官员--不论官阶高低--有权规定什么是正统的政治、民族、宗教等观点，也没有任何官员有权强迫公民以言行承认自己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么例外现在还没有出现。

法官在判决中继续写道：我们认为地方当局强迫学生向国旗敬礼和宣誓的行为超越了它们的宪法权限，构成了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精神和智力的侵犯。

和纯粹的“言论”相比，拒绝向国旗敬礼、焚烧国旗、倒悬国旗、佩戴黑袖章反战等都属于所谓的“象征性言论”，静坐、游行、示威等属于“言论加行为”，都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兰（Justice Harlan）说：本院从来没有把言论的权利限定为只是口头表达。

学生批评学校食堂伙食涨价在北大就被划为“思想偏激”，那么联邦最高法院保护的那些“象征性言论”如果发生在北大，中国人都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在 1965 年，在爱荷华州也发生了一起学生“思想激进”案。爱荷华州 Des Moines 地方的一群学生举行集会，决定在假期佩戴黑色臂章，表达他们反对政府卷入越南战争。Des Moines 当地的校长们闻讯后，迅速采取措施，制止学生们在学校佩戴黑色臂章，违者将遭停学。

15 岁的高中生约翰廷克（John Tinker）和他 13 岁的初中生妹妹玛丽拜慈（Mary Beth）拒绝了学校的规定，坚持佩戴黑色臂章到校，结果被立即遣送回家，在他们同意学校不得佩戴黑色臂章的规章之前不得上学。

廷克和妹妹及其父母把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 7：2 作出判决，认为：学生佩戴黑色臂章以表达某种观点属于象征性言论，这种言论在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范围之内。学生的这种静默的、消极的表达思想的行为，没有证据显示干扰了教学秩序，学校当局对学生佩戴黑色袖章到校的禁止，是宪法不能允许的。

在校批评食堂涨价就荣膺“思想偏激”的称号，到社会上批评物价上涨，校方会不会追授一个“思想偏激+”？如果有一日，中国社会满眼和谐盛景，到处赞美飞扬，顾某就知道北大的教育目标实现了。那时，我们可以称中国进入了一个“北大新国民”社会。

顾某没指望看到北大某位学生不服“会商”，把官司闹到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别介，中国的最高法院不管哪个。对于中国宪法，顾某强烈的印象是国庆游行中的宪法花车方阵。宪法一日不从花车上下来，那它一日就是花车上的宪法。只能远观。

和美国学生的这些“偏激”相比，北大学生只能在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中寻找安慰。“祖上阔过”。

（顾献，专栏作家。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7648a01017xib.html）

【思】

7-6 刘老石：老师是用来牺牲的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2010 年 7 月 31 日，我正式辞职——辞去了天津这个大学的教职，这距离我成为大学老师刚好十年。

很难说清楚这种辞职的感受，一方面，我深爱着这个岗位，我每个学期都要和几百个青年人打交道，我竭尽我的能力把理想、知识和做人的准则传递给他们，像浇完水的园丁，看着他们在一点点的改变，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我是 2000 年 7 月份作为引进人才正式到这个学校的，那时的学校还是一个简朴但是温馨的学院，社科部只有 20 多个人，但是气氛还算好。于是我可以满怀激动地准备着每一节课。不久我到另外一个院系做兼职辅导员，分工是负责学生活动，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凭借我对大学的理解，我知道青年人最缺少的是什么。于是我宣布了一条新政策，即每个愿意做社团的同学只要是愿意都可以随时成立社团、组织活动，我将给予必要的协助。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二十多个学生社团成立了，其中包括调研社、时事政治研究会、朱镕基研究社，也包括大话西游协会、羽毛球协会，雨后春笋。后来有几个社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狂疯演讲口才协会，学员们会站在人流如织的食堂前的桌子上，反复的高声咏颂、大声演讲，会在图书馆前的台子上高呼人生信条，会到每一个宿舍中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真诚。另一个至今还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社团是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从 2000 年冬天开始下乡调查支农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这个社团已经成为全国二百家社团中的创始者和楷模。我坚信，学生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做好青年人自己的事情，他们的朝气和激情将会让他们脱颖而出，他们的美好人生和品格也会在与社会和现实的交互中获得升华。没有激情的人生不属于青年人，对人的管理只能是顺应和因势利导而不能压制。

虽然蓬勃的学生活动使得这个学校焕发了从来没有的生机，至今十年还无人能及，虽然有人据此提出“学生社团是未来学生工作的基点”的理论。但是伴随着同学们的热情迸发，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担忧，先是埋怨，后是压制。一年以后，我如期结束了我的辅导员工作，社团的蓬勃也就昙花一现，留下来的是几个坚韧不屈的学生社团和一批激情的青年人。

从此，我成为专职的公共课老师，我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也和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他们同样用睡觉和逃课来对付我的上课。面对着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须改变他们，我必须要领着这些青年人向前走。我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就是改变目前此类学科最令人恶心的方面，就是不敢面对现实，空话套话连篇。我发誓如果我做一天我就要让青年们向现实看一天，多从现实中获得一份道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追随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一个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从此我开始和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年的寒暑假和“五一”、“十一”的长假，我都会带领一队学生到农村去，调查也好，体验也好，但是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获得认识，学会善意。

虽然 2000 年的农村村村抗争，乡乡点火，烽火遍地，但是是不会有多少青年人愿意到农村去关注他们，更不要说去调查。于是只好打着“农村文化旅游”的名头，在校内招到了六个同学，到山西左权县麻田镇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地方。只有一个星期，也只是观感式的做了一点调查，但是从此这些同学没有办法脱离农村了，其中四五个人在以后多次下乡，并成为校内学生活动的骨干，有些人直到大学四年级还在下乡，直到今天毕业近十年了，他们还和我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此心中有了农民，有了善良，也有了人。这种试验更多的还是对青年人信心的激励，我相信这种方法的价值。当那些愚蠢的心理学家们期待用什么心理辅导员来把社会问题内化成心理问题，以此来解决学生跳楼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青年人其实已经被他们的学科和狭隘绑架了。从此，我决心把青年人更多的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们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自己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

我也知道，在我所在的这个学校里，无法获得视野有限的社会科学老师和狭隘的领导层的支持。于是我投奔当时一个著名的媒体（也是研究机构）做兼职工作人员，在这里，我开始把青年人到农村去的工作推广到北京各个高校，后来又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此后的岁月里，这几乎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的两手中托着不同的弱势群体，一边是在衰败的农村中亟待帮助的农民，另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学生。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结合起来，让农村获得些许帮助，让大学生们认识到现实，从而跨越自我和社会的鸿沟。

青年人的热情和渴求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到农村的学生社团一下子扩大到 80 多个，下乡成了理想青年的一种时尚追求，几乎在各地的团队中吸纳的都是所在学校的理想青年，各校的支农团体也一下子成了进步青年人的理想王国。青年的这种理想选择不是偶然的，我更相信他们是对我们窒息的大学和沉沦的物欲的反叛。

没有哪个有想法的青年人不对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打游戏、谈恋爱，逃课、抄袭成风感到迷惑，没有哪个青年人不对讲课内容的空洞无物、讲课老师的死气沉沉感到绝望。激情四射的青年们竟然成了就业、考研和英语四级及新东方的奴隶，如此他们怎么能够不“郁闷”？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校园里，所谓的先进理论和理想竟然是倡导青年人去发财和找个好工作；而那些声名远播的人生导师们竟然是以倡导青年人更加自我和自利，以及打破

人的底线和廉耻为基本立意而哗众取宠，如此又有哪个有头脑的青年们不痛苦、不背叛？年轻的心注定要追寻高远博大与正义良知，而他们却被闭锁在拥挤不堪、瘴气飘浮的狭小校园中，每天被教诲着成为自私自利的猪彘。请问，青年人如何不背叛，青年人如何不在痛苦的煎熬中逃避甚至跳楼？

一个惊人的事件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所在的天津的这个学校的支农社团得到进步青年的积极拥护，影响全国，但是却受到团委某些人的压制，不给注册，不许活动，不许招生，不给经费。这些同学实在无奈，就干脆自己写了招生海报挂了出去，但是姓杜的团委负责人竟然把他们的海报撕掉，同学们愤怒已极，同该人大吵，并且找校方理论，校长躲避，他们就在在校长办公室门前整天等待。又将所有的信息发到网上，引起了巨大关注。校方非常恐慌，在半夜一点找同学们道歉，并且同意同学们的各项要求。校方低估了学生捍卫真理的勇气，同学们也没有想到学校会如此的懦弱和不堪一击，其实当初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决定鱼死网破，作死一拼而已。

但是能够为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抗争的有几人？多数都在命令和压制中沉默了，这种压制的沉默注定会形成消极的对抗或者逃避。

但是，这件对抗事件对我而言导引出的一个结局是，有关官员猜测这件这个学校从来没有的事情的幕后和我相关（意即由我主使，他们不相信学生会有如此的决心和能力。其实我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他们完全不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也不考虑青年人的成长要求。他们只想找回自己的面子。

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本性，也不屑于去辩驳，更无法去证明，我如何和一个强大的体制对抗呢？我决心以后小心做人就是了。

我并非是个特立独行的另类，相反我是一直寻求各种方法能够把我在校外的经验认识和工作成果引入到这个学校的。我先后多次给学校几个领导写信和建议，建议他们能够顺应大学生的成长要求，成立大学生人文素质研究机构。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后来我又提出成立农村问题研究机构，我认为农村问题日益严重和亟需解决，我们学校的研究基础薄弱，如果能够从农村开始无论是对老师的研究还是对新领域拓展，都会有帮助。尤其是对那些青年教师。这个建议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有些人开始和我一起下乡调研，有些人开始向农村研究转向，但是却被当时的主管领导和院负责人视为异类。我当时诚挚的要求，我说我做农村问题行动研究多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个试验点，积累了相当的资料，而我们的老师却苦于没有研究方向，科研教学没有出路。我可以无偿的把这些拿来让我们的老师使用，可以让这些老师向这个方向投入精力，由此带起一个良好的研究和学习氛围，这也符合老师们的意愿，同时我们的老师也可以给更多的青年学生做指导，这是两好的事情。考虑到学校的经费的困难，甚至我可以帮助联系研究资金。但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没有任何理由。

四次如此的建议之后，2008 年我写了最后一封信，我说，如果早在四年前就按照我的建议建立相应的机构，今天我们会有多大的成绩，会有多少科研论文发表，会有多少老师受益，会

有多少同学受益，我实在不明白如此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几年之后我已身心俱疲，无力再做这件事，所以我是最后一次向你们校领导提建议，建议你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报告。我把写好的信和建议送给了每个领导和我们的院系负责人。我知道他们不会给予答复，他们也确实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极具讽刺的是那个院负责人却从此自己搞起了农村问题，并且发了几篇文章。最后，我注意到他挣扎了多年终于评上了教授，他评教授的几乎是唯一的一篇有点分量的文章就是关于农村的。（请原谅我们学校的教授的水平，这个人的职务科技空间看看是书记。）

我明白，想要在我们这个学校里弄出点什么动向来是绝对没有可能了。从此我没有给他们写过任何建议，也不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希望。我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学生支农的运动中，指导和带领他们浩浩荡荡的到农村去，调查、扶贫、支教、建立合作社，推动文化发展。这个运动不仅仅锻炼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也同时推动了农村问题的关注和新农村建设的概念认同，也得到了某重要中央领导的写信支持。由此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挡住这场优秀的青年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救赎的运动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有如此多的优秀青年为伴，我把它作为人生的荣幸。我们推动了第一家真正的青年公社，让那些青年人结伴而来，终身奋斗。

但是如果你认为我由此会不务正业，甚至影响了教学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自认为我是这个国家最尽职的老师中的一个。我可以不关心学校的改变，但是我必须认真上我的课，我必须对得起这些青年人。我设计的课程是以青年成长为核心，实践和读书为两翼。在可能的场景下，我都会把告诉青年们如何做人、如何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如何肩负时代使命作为讲课的主题，他们会很信服我说的要做好人的“说教”，他们也会非常信服我告诉他们的要抓紧时间决定人生走向的建议；我给他们建立了读书小组，推荐他们按照兴趣方向去读书，我给指导；我几乎每堂课都会介绍最新发生的事情和评论，总会有人说是从我的口中得知最新的中央政策和世界动向。

至今引以为豪的事情是，我上实践课的方式的创新。我把他们分成三人小组，让他们去调查食堂里卖饭的小妹妹，门前站岗的保安，后院卖鸡蛋灌饼的阿姨，或者是他们年级的师兄和师妹。他们把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交给我作为他们的作业。我惊异于我的创新会得到绝大部分同学的拥护和感激，并由此推动了实践教学的几乎是唯一的无成本高效能的改进。

我做的这些得不到这个学院主管领导的认同甚至变相排挤是正常的，我从来也就没有想得到这些智力水平不高、政治素质不够的官混子们的认可。但是我坚信我做的这些会有益于青年人。所以当若干年后，还有多年前的学生从马路的对面跑过来和我打招呼并自动介绍自己是我从前哪个班的学生的时候，当很多青年人离校多年还跑来听听我的课的时候，当班级里的青年人跑来跟我商量决心离开大学选择新的人生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我可以不在乎下了火车不吃饭就给他们去上课，也可以不厌其烦的为他们寻找最好的教学材料而奔波，但我在乎他们的收获，在乎他们的成长。

很多青年人的成长是戏剧性的，很多事情的荒诞却是超出戏剧的。一个小女孩突然跑过来找我要参加下乡和培训，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很单纯。我当然很高兴，他此后来了几次，很积极和很主动。但是后来突然消失了，大约一年后，这个女孩突然发了一个邮件来，她说，她非常感激我。他本来是学校有关领导派来调查我动向的“卧底”，可能给予的条件是给她类似研究生保送的“待遇”。但是当她参加了我们的培训和下乡后，她发现我们讲的道理、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回校后和校领导说，我不打算做研究生了，我打算和他们一起下乡帮助农民。学校领导自然诧异万分，软劝硬说。最后这个女孩自己考上了北京另外一个学校的研究生。当没有学校的压力后，她给我们写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呵呵，理想对优秀青年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物利和压力。

事实上，我在校内的一次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研讨会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今天“两课”教学和青年工作有两个外部条件是要认真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世界金融、经济大危机后，原来青年们中以美国为主导的对资本主义的美好向往已经打碎了，也就是说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迷信已经不再吸引青年人了,我在课堂随机调查时发现确实如此；另一个是国内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过去唯经济唯 GDP 的有失人性的发展观受到彻底抨击，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原来青年人中谁提公平正义就会被辅导员关注或者谈话，但是在今天确是同和谐社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觉悟高的表现。由于整体政策环境的变化，使得同样的工作其实质却已发生了转化。

由此青年们从自身本性出发注意到并且热烈欢迎这个时代的最新变化，青年们追随自己的本性，天生认同公平和正义。这样无论从外还是青年的内心都应该推动青年们追随于这个变化。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应该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变化，并相信青年们会追寻着这个理想之光向前走。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让青年追求理想，积极拓展，相信青年们会坚定的和大方向站在一起。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各个大学还在因循着九十年代以来的工作传统，对青年学生管卡压，生怕青年们惹出什么麻烦，甚至有意识的管控，或者鼓励和相信庸俗不堪的学生官僚去压制大多数学生，进而导致学生的无望和跳楼。这样做的结果是，本来应该成为青年灵魂塑造者的老师和做青年工作的人，非但不能引领青年们，相反却走向了广大青年学生和中央政策的对立面。这个阶层由此就陷入了非常痛苦的两难境地。而与此同时，由于主管部门的保守，使得广大老师也不能放手让青年们率性发挥、认真思考，而是说假话编空话，把“两课”的老师们也推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如此看来，需要的不是青年们的改变，不是对老师们的变相压制，而是管理层的解放思想。

到了 2009 年底我已经决定辞职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在学校里做学生社团的指导工作了，我怕给学生社团带来不利。几年前，当学生社团来请我当他们的指导老师的时候，学校的有关领导就来设阻，甚至以不给资金相威胁。我也并不在意他们几个干部合谋不许我评职称，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我早已视他们给的名利如粪土，我只在乎国家命运。之所以最后决定辞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竟然直接干涉我的课堂，不许我给学生以调查的方式布置作业（他们要求我和他们一样放个录像片权当上了实践课，同时也要求我随便留个什么题目让学生到网上荡一篇文章作为作业）。我明确告诉他们这是让我由人退回到猴子状态，这违反了我做人的

基本原则，我不可以如此不负责任。此后，因为我批评教务部门思想僵化，课程改进不利，他们竟然派人以听课的名义骚扰课堂，甚至找个理由来报复我。我“不对”的地方是，让他们每次都找不到报复的理由，他们很生气又很丢脸面（呵呵，我本来就是个不愿意给“脑残”的人面子的人）。

此后，我自动竞选了“教工代表”，我希望这个职位能够为青年教师多争取一些说话的机会。我由此公开批评了学校有关部门和主要领导。我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但是我知道没有带来多少像样的正面变化。可能算个变化的是，当我理直气壮的退回他们借着开会的名义发来的高档皮包之后，第二次开会他们就乖乖地只发来了个塑料袋。

我知道我的辞职没有最终信守要为老师们说话并且改变他们排课和坐车难的承诺。所以，在拖延到了聘期的最后一天，上完了最后一次课，批改完最后一次考试卷子，认真的核对了每一个人的成绩并确认无误后，我最后递交了一份给领导们的信，要求他们能够认真对待老师们的要求，改进行政部门的工作（也是我最后一次公开信）。然后，离开了办公室。回头再望望灰蒙蒙的教学楼，我在心底里说，再见了，同学们；再见了，××大学。但愿你的未来会更好，但愿青年们的未来会更好。

在想象中，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似乎应该会非常的愤怒，他们也似乎担心我会找他们的麻烦，但是其实我心静如水。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狭隘和他们怯懦的嘴脸。是的，身处一个多难的时代，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哪有理由独享安乐，而不同这个民族同甘共苦呢？更何况你还是一个老师？

但是我疑惑的是面对着这些日益焦躁的青年们，管理部门还有多少时日抱残守缺，我们还有多少狠心让青年们一批批的倒下？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流石
2010 年 8 月 19 日

（刘老石，本名刘湘波，曾执教于天津科技大学。3 月 24 日因车祸辞世。原文链接：http://www.liuxiangbo.net/21.html）

7-7 周保松：重建中国大学的价值教育



大学教育有两个基本使命。第一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生活，活出丰盛幸福的人生；第二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活在一起，共同建设公正社会。这两个问题均牵涉价值判断和价值实践，我称其为价值教育。可以说，培养学生成为有智能有德性、具批判力和社会承担的知识人，是大学教育的目标。

很可惜，到今天，价值教育已现危机。很多大学已不再视承传、捍卫和实践人类价值为一己使命。用来肯定自己存在价值的，更多是大学排名、收生成绩、毕业生 出路、论文数量等。在大学课程中，学生亦少有机会认真思考道德是非、人生意义及社会公正等问题。这带出几个问题。一、价值教育的重要性在哪里？二、价值教 育为什么会被边缘化？三、如果重提价值教育，方向应该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价值问题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离不开价值。人的独特之处，是能够作价值判断，并由价值指导行动。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会选择做对的事，过好的日子，坚持某些信念，努力活出有意义的人生。而要活得好，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欲望信念作出反思评估，确保自己作出正确选择。

简单点说，因为人有价值意识，所以意义问题必须由价值来支撑；因为人有反思意识，价值的规范性必须得到理性主体的认同。所以，大学应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 境，让学生的价值意识和反思意识得到充分发展。关键之处，是容许学生自由探索不同的价值问题，包括阅读人类文明的种种经典，讨论当代社会的政治及伦理议 题，以至对一己心灵的不懈内省。没有这一过程，我们难以理解自我，也无从肯定生命的价值立于何处。

价值的实践，必须在社群当中进行，因为人不是孤零零的个体，而是活在种种制度和人际关系之中。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合作关系，彼此的权利义务和合作 所得应该如何分配等，是公共生活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人也活在自然之中。但经过数百年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人类完全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并导致巨大的生态 危机。因此，必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保育和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迫切议题。

由此可见，从人与自身，到人与社会，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均牵涉价值教育。我们作为价值存有，面对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价值，而是如何发展人的价值意识，如何论证和肯定合理的价值观，以及如何实践有价值的生活。这些都是大学教育的任务。

价值教育边缘化四个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价值教育在今天愈来愈不受到重视？这是很大的题目，这里我只谈四点。

第一，大学日趋职业化。大学将自身定位为职业训练所，并以培养市场所需人才为最高目标。

例如大学将大量资源投向热门的职业导向课程，滥招学生，漠视质量。而在评核教育成效时，则往往只以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作为衡量标准。在这种环境下，价值教 育将难以展开，因为职业训练基本上是工具理性的思维，目标早已由市场定下，不容置疑，剩下的只是教导学生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达到目标。和这个目标不相干的 价值，要么被忽略，要么遭压抑。

工具理性的能力固然重要，但如果整所大学均着眼于此，却没有提供足够的知性空间，容许学生对市场社会的主流价值作出反思批判，那将严重窒碍学生的价值意识的发展。

第二，在以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主导的现代大学，常常主张知识生产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并将所有牵涉价值判断的问题搁置。

这种观点认为，所有价值命题都是主观和相对的，因人因社会因文化而异，不算真正的知识。大部分学科因此纷纷从价值领域撤退，声称只是对自然和社会现象作 中性解释。因此，商学院的目标，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运作；理学院的宗旨，是解释经验世界的内在规律；法学院的精神，是训练学生成为合格的律师。问题却非如此 简单。商学院的学生，难道应该毫无保留地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而对其导致的社会不公及异化宰制毫无反思？理学院的学生，难道只应埋首实验，却对基因工 程、复制人以至核能发展等引发的伦理问题漠视不顾？而捍卫人权法治宪政，难道不应是法学院学生的基本关怀？

广义一点看，所有学科之所以有存在必要，必然是因为我们认定其对人类文明的承传发展有所贡献。一旦承认这些价值，以中立之名拒斥价值教育的做法，实际上有违大学教育的理念。

第三，中国的教育体系，从中学到大学，长期以来都将价值教育等同于思想教育，并要求所有学生接受同一种思考模式，严重伤害他们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但人不是机器 ，而是活生生的有反思能力和自主能力的个体。无论多好的观念和理论，一旦强行灌输，就成了教条，难免窒碍自由心灵的自由发展。

最后，价值教育在今天举步维艰，更根本的原因，是社会早已合理化自利主义，使得人们不自觉地相信个人利益极大化是做所有事情的最终理由。风气所及，自利 贪婪不仅不再被视为恶，反而被当作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并在制度和文化上大事宣扬。如此一来，所谓幸福生活自然被理解为个人欲望的满足，而 道德考量则被视为对个人利益的外在约束。“只要不被人发现，什么都可以做”遂被广泛接受，伦理规范则逐渐失去内在约束力。

重建价值教育：使命、良知与自由

价值教育的边缘化，结果是大学批判精神的丧失。所谓批判精神，是指学生有勇气有能力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对各种价值问题作出反思论证，挑战既有的观念习俗制度，并在生活中实践经过合理证成的价值，从而完善生命和推动社会进步。代之而起的，是实利主义、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充斥大学校园。

就我所见，今天很多大学生根本未曾经历过价值启蒙便已离开大学，并安分进入既有的社会建制。他们不曾有机会好好认识自己，不曾试过和同学激烈辩论道德宗教，更不曾在面对身边及社会种种不公时，想过要起来为权利为公义而争。

在理应是他们最自由最富理想的时期，大学没有提供机会，让这些优秀的年青人认真面对生命及生命背后承载的价值。这样的教育，实在难以培养出有见地有抱负有价值承担的公民。没有这样的公民，整个社会将停滞不前，甚至向下沉沦。

要改变这个处境，首要的是大学必须重新理解自己的使命，肯定价值教育的价值。教育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使命是育人。人是教育的中心。透过教育，来提升人，转 化人，鼓励学生培养德性，并活得自由丰盛幸福。我们应先立其大者，并以此为大学目标。有了这目标，才能见到价值教育的重要和迫切，同时看到市场化职业化专 业化和这个目标之间的张力。

下一步，是重新肯定教学为教师的首要工作。不知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之内 隐隐然已有这样一种共识：要在大学生存，必须不花时间在学生身上，因为学校评核重视的是研究和出版，不是教学。所以，用心教学，等于和自己过不去。这种将 老师从学生身边赶走的制度若不改变，价值教育将无从谈起。

道理再浅显不过。既然教育的目的在育人，育人 的责任在老师，老师不能尽其责，目的也就永不能达。做过老师的人都知道，理想的教学，是心灵与心灵的相遇。要启迪学生，老师需要言传身教，倾注大量心力和 学生对话交流，更要像园丁那样关心每个学生的成长。初入行时，有前辈语重心长对我说，教育是讲良心的事业。这些年下来，我稍稍明白个中深意。良心是向自己 交代的，是自己加诸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为了什么外在好处。但在今天的大学，要保守一个教师的良心，绝不容易。

再下一步，即使我们重视价值教育，也要打破将它当作几门课程，又或专属某个教学部门的思维。要有效发展学生的价值意识和批判精神，大学要有整体的教育 观，并将价值教育的理念渗透到大学每个环节，包括主修课程和通识教育、宿舍生活和学生社团活动等，让学生时刻能够思考价值，实践全人教育。

最后，大学必须创造一个活泼多元，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让师生在其中自由探索。价值教育不应是独断的、教条的、家长式的灌输，每个学生都应是独立自主的 个体，有自己的判断

能力，同时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大学不应将学生倒模成千篇一律的人，而应鼓励他们发展潜能，活出个性。因此，不要误将价值教育等同于 政治教育或党派教育。

价值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反思能力具道德意识且关心社会的自由人。有人或会问，既 然推崇多元，岂不表示大学要在所有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并非如此。思想自由是大学不可动摇的基本价值，而在自由之外，一所大学还应有更多高远的理念，包括 鼓励学生热爱真理、追求公义、平等待人、重视环保、关怀弱势、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等。

无疑，当大学希望学生具有这些德性时，它已宣示了某种道德取向。教育的目的，总是将人由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更好的状态。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价值，而在于这些价值是否合理。真正的自由教育，不代表大学放任不管，随学生喜欢怎样就怎样；也不代表大学要伪价值中立，不敢有自己的道德信念。它所期盼的，是创造自由的空间，容许 自由的人在其中自由思考，学会分辨什么是好的和正当的价值，然后在生活中好好实践这些价值。

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以至中国的未来，相当程度上系于价值教育是否在大学中仍然有其价值。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师。原文地址：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ad85044922789521）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Co-China 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放大现场。目前已举办十七场论坛，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卢思骋、闾丘露薇、毛向辉、潘毅、冉云飞、宋以朗、许宝强、叶荫聪、张铁志、周保松、朱大可、朱凯迪等。第十八场论坛会于 4 月 2 日下午举行。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标题为“订阅周刊”正文留空的电邮至：
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论坛网址：http://www.my1510.cn/author.php?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Co-China 论坛近期活动预告】

「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第十八期——中东之变

过去数月，从埃及、突尼斯到也门、巴林、利比亚，民众运动此起彼伏。有人称其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有人称之为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觉醒。无论如何，变革正在发生。

利比亚的战局会如何演变？埃及新政府上台之后民众面临的是怎样的「变」与「不变」？这一波变革的背景究竟为何？又带来怎样的意义和启示？刚从埃及返港的国际 观察家张翠容和暨南大学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庄礼伟会谈谈他们的观察与思考，「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第十八期--中东之变。

讲者：
张翠容：资深记者、国际观察家，多次去到中东、北非、拉美等地区，著有《中东现场》、《拉丁美洲真相之路》等。
庄礼伟：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政治分析、政治哲学。

主持：
杜婷：「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负责人

时间： 2011 年 4 月 2 日（周六）下午 3 时-5 时
地点：香港科技大学 Lecture Theatre E
twitter 直播账号：@roseluqiu（http://twitter.com/#!/roseluqiu ）
新浪微博直播账号：CoChina 论坛（ 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視频直播 1：http://www.livestream.com/cochinahk
视频直播 2：http://connectpro10214975.adobeconnect.com/r71393025/
音频直播：http://now.in/radio/cochina
合办机构：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

轮值编辑：黄隽咏、舒欣
版面设计：豆弟
技术支持：毛向辉
出品人：杜婷